

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李娟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 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 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 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 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 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这里, 我们概要地介绍一下索绪尔的生平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他的语言思想具有的划时代性的历史地位以及理论的局限。

—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学者世家, 祖籍法国。他的家族中多自然科学家, 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祖父是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 父亲是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但他父亲的一位挚友阿道夫·皮科特 (Adolph Pictet) 研究语言古生物学, 他引导索绪尔学习语言学, 这使得索绪尔很早就掌握了欧洲多种语言以及古拉丁语和希腊语。上中学时索绪尔就已经开始学习梵语了。

1875年, 索绪尔遵循父母的意愿在日内瓦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的化学、物理和博物学。家庭的传统和早期的自然科学的教育使索绪尔的思想形式深受科学思想方式的影响。意大利的语言学家 Mauro 曾言, 达尔文把科学的态度描绘成怀疑主义和大胆设想的一种适度的结合: 每一个论点, 哪怕是人们最能够接受的, 也还是当作一个假设来看待; 而每一个假设, 哪怕是最奇特的, 也被看作一种可能成立的论点, 并有可能加以证实和发展。索绪尔把这种态度体现在语言学当中。这也许和他早年接受的自然科学研究观念的熏陶不无关联。

1876年索绪尔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语言学。适逢“新语法学派”成立, 索绪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观点, 但似乎并不属于学派的核心。1878年, 索绪尔转至柏林大学, 发表了著名的《论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Me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eennes)。这是索绪尔早期的代表性著作, 是一篇有关语言的历史研究的论文, 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比较法。他把原始印欧语的语音系统看成一个有规则的整体结构, 因此从语言结构的不规则处着眼, 拟测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索绪尔用这种方法解释了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的一些问题, 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喉化音理论”, 在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也奠定了索绪尔当时在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半个世纪以后, 人们发掘出了古印欧语赫梯 (Hittite) 语的材料, 证明了索绪尔在半个世纪以前拟测的正确性。这篇论文的理论方法已经显现出索绪尔从系统整体把握语言的思想。索绪尔在柏林住了18个月后又返回莱比锡, 他写了一篇关于梵语中绝对属格用法的论文, 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

1881年, 索绪尔来到巴黎, 在巴黎的高等应用学院教授古代语言和历史语言学, 同时也参加巴黎语言学会的活动。当时巴黎语言学会是语言学的中心。索绪尔在巴黎教了十年书, 对法国的一代语言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1891年, 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大学任教, 教授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课程。从1907年开始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 先后讲过三次。1913年去世, 终年56岁。

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后比较沉默孤独，很少写作，这与他的语言学思想的超前性有很大关系。他在给他的学生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Meillet）的信中流露出对当时语言研究状况的失望，他感到有关语言的一些根本问题需要澄清和界定，但同时又对完成这一工作存有疑虑。他对自己的提出的理论始终不满，一直不断修正。他的普通语言学课程讲了三遍，三次课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始终没有讲稿，似乎并没有兴趣写成一部著作。索绪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Ch.Bally）和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收集许多听课笔记，据此整理出《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由于这本书不是本人所写，所以不断有后人做考证、注释的工作。一切表明这本书基本上忠实于索绪尔的思想。现在《教程》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成为语言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正是这部著作开启了语言整体结构研究的新阶段。

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学科已经遇到那种建立在机械主义和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原子式研究所带来的困惑。因为单独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带来人们对于整体的可靠认识与把握。在语言学界，青年语法学派在理论上过于强调机械的、实证的方法，使研究者无视言语现象背后语言整体的存在，把可直接观察到的个人的言语事实作为唯一的语言现实，忽视语言的社会功能，最终使理论自身陷入危机。看来，要更确切地认识事物的整体，就要首先就整体来研究。而对于语言来说，怎样才能达到对整体的认识 and 把握呢？这个整体是如何存在的呢？当时的许多语言学家都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而索绪尔是其中之一，并且做出了独特的系统的阐述。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学术背景，他多年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对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对整体语言学学科的性质有相当全面而深入的思考。我们从他多年所开课程可以证明这一点。（参见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

1881年，日耳曼比较语法

1887年，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

1888年，立陶宛语

1891年，印欧语言比较

1892年，自此每年教授梵文课程

1892年，希腊与拉丁语音学，印欧语言的动词

1893年，希腊与拉丁语源学研究，希腊语动词

1894年，古希腊碑文选读，希腊语的名词性、数、格变化研究

1895年，波斯诸王碑文，希腊方言与古希腊碑文，荷马史诗的语源与语法研究

1896-1903年，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方言

1902-1903年，欧洲地理语言学（古代与近代）

1904-1905年，英语与德语的历史语法

1906年，日耳曼历史语言学，古英语，古高地德语

1907年-1911年，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

此外还教过当代法语音系，法语诗律，德国神话诗等等。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当时的语言研究的深切的了解，才有对现状的不满，才有更深入的思索。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理论毫无疑问汲取了前人的思想，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17、18世纪的唯理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以及普通语言学的开创者洪堡特的语言形式观念，等等，都对他有很大影响。而同时代的青年语法学派，特别是保罗的心理主义语言学观念，可以说是索绪尔的社会心理语言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他是否

了解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J. Baudouin de Courtenay）的音位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二人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此外，美国的语言学家辉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的语言观对索绪尔的影响也很直接。辉特尼早年学习梵语，1850年去德国学习语言学。他1867年著有《语言和语言研究》（*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1875年发表《语言的生命和成长》（*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反对自然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的社会因素，强调语言的规约性和惯例的性质。索绪尔在他的《教程》中多次以赞赏的口吻提到这位语言学家。

同时代的其他思想观念也与索绪尔语言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关系。法国的“现代社会学之父”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社会学思想可以说是索绪尔的社会语言观的重要来源。在涂尔干之前，由于十九世纪末经验实证主义的影响，“社会”被看作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现象，不是客观的实体，而是每个人感情和行为的结果。人们只看到个人，社会中除了个人以外再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了。但涂尔干认为，社会不是个人行为的总和，而是第一性的实体，它对人有外部制约，而个人对此有时是无意识的。正是由于社会实体的存在，个人行为才成为有意义的行为。社会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心理现象，社会是一种心理实体。索绪尔接受了涂尔干的思想，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心理实体，从而建立起社会心理的语言观念。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很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

索绪尔的思想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结构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1912年形成于德国的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学派（Gestalt），这与《教程》的形成几乎是同时的。可见，索绪尔语言思想的产生是同时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和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共同结果。

三

《普通语言学教程》全书分六部分：绪论、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和结论，其中前三部分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历时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基本延续了前人的观点，但纳入了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地理语言学属于外部语言学。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前三部分的内容。

在绪论部分，索绪尔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把复杂的语言现象分为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和言语行为（*langage*）三个层面。

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每个人的言语行为性质是多方面的，跨许多领域。它既是物理的，又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是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的。

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是个人被动地从社会接受而储存于头脑中的系统。它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外，是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具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运用。

语言和言语紧密相连，互为前提。个人要说话使人理解，必须用语言，同时语言的存在又必须体现在言语当中，而且，使语言发生变化的也是言语。所以，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

索绪尔认为，应该有两门学科分别研究，一门是语言学，一门是言语学。为了强调语言的同质性和系统性，索绪尔还提出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区分，一切跟语言的机构、

系统有直接关系的要素都属于内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索绪尔在确定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质同时又指出，在社会现象中有一类特殊的社会事实，就是符号。语言就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他提出设立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符号学，语言学应是符号学的典范，这是它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因此，索绪尔也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

这样，索绪尔首先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并对其性质做出了第一次概括，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在一般原则的部分，索绪尔进一步论述了语言的符号性质和存在。

索绪尔首先为语言符号概括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是符号的任意性，一个是符号的线条性。这是对语言符号系统进一步论述的理论前提。

所谓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指语言符号单位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概念，称为符号的所指，一个是音响形象，为符号的能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不可论证的。

关于语言中音与义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论争。并非索绪尔最先指出语言中的音义关系带有约定性，不过，却是索绪尔首先为音义关系的任意性确定了在理论体系中头等重要的地位。他首先明确否定了以往的“约定论”中孤立地看待语言单位音义联系的立足点，认为语言不是分类命名集，不是给已经存在的概念范畴命名，相反是在语言系统中创造出概念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孤立的符号单位具有外在于系统的价值。同时他也否定了从语源方面对音义联系探询和论证的意义。因此，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完全不是就符号的创制或产生来说的。在索绪尔看来，任何时代任何社团的说话者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前人的语言遗产。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是一个既定的系统。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就一个系统中的单位价值而言的。正是由于符号单位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符号在整个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所以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系统制约的，二者在实质上没有可论证性，是任意的。这样，语言结构的整体成为第一性的，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主体。他认为，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实际上，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基石。

符号的线条性是指符号只能在时间上展开，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索绪尔认为，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其重要性与第一条原则不相上下，“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的”。索绪尔在后面谈到了制约着整个语言系统运作的两种重要的关系，即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其基础就是符号的线条性。我们在以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结构的分析中发现，线条性往往是语言单位的切分和替换的基本前提。

明确了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性质后，索绪尔对语言的存在做了比较全面的把握。把它放在时间和大众的实际背景中，指出了语言系统对于使用者的强制性，即语言的不变性，以及时间带给语言的缓慢的连续的变化，即语言的可变性。他特别强调，语言的变化印证了每一语言状态的偶然性和符号的任意性，这是 19 世纪语言的历史研究带给人的启示。

正是基于语言的这种存在状况，索绪尔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成系统。

索绪尔指出，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都具有内在的二重性，必须区分两条轴线，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关系的同时轴线和事物在时间中的变化的连续轴线。二者的研究在方法和原则上是根本对立的，必须加以区分。一个作为价值系统的语言结构必须是同质的关系系统，要素的价值取决于系统的状态，不取决于要素的历史。例如，盎格鲁·撒克逊语中，*fot* 的复数 *foti* 在第一次音变中变为 *feti*，在第二次音变中词末的 *i* 脱落，*feti* 又变成了 *fet*，但两次音变都未改变它在系统中的价值，*foti*、*feti* 和 *fet* 的价值不取决于它们自身，也

与变化无关，而取决于在不同时间的系统中与单数形式 *fo*t 的对立。因此，语言的演变都是个别要素的孤立的变化，它们是一些与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要确定要素在语言系统中的价值，只能从共时的状态中把握。

这样，在“一般原则”这一编中，索绪尔阐释了语言符号的基本性质和存在，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划分，进一步确定了语言共时研究在语言系统研究中的首要地位。

在第二编“共时语言学”中，索绪尔提出语言共时描写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其核心为价值理论。

索绪尔首先提出了在把握特异共时系统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即语言具体实体的确定。所谓具体实体，就是指由能指和所指两面结合而成的符号单位。

符号单位的确定在过去不是一个问题。历来词作为语言基本单位是一个初始的概念，词的同—只是声音和意义两方面同一的综合。不过，索绪尔指出了问题的复杂性。他揭示出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事实，即人们心理中的一个词在具体使用中具有千差万别的声音和意义，所以词的同—不是简单的声音和意义的同一，不能凭实质 (*substance*) 确定单位的价值和同一。事实上，单位实体是一个形式实体，它的价值是由它在语言系统中与其他实体的关系决定的，而单位的同一实际上是这种价值的同一。由此，索绪尔提出了其语言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理论。

索绪尔分别从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两方面论证了符号价值的确定。他指出，概念没有什么初始的东西，它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关系决定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例如，英语中的 *sheep* 和法语中的 *mouton* 都有“羊”的意思，但二者价值并不同。在法语中 *mouton* 还可以指烧好的羊肉，而英语中的 *sheep* 却没有这个意思。这是因为英语中还有 *mutton* 一词，专指羊肉。所以概念价值的确定必须立足于单位存在的语言系统。另一方面，语言的能指实质上不是声音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

这样，一系列的概念差别和音响形象差别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积极的语言符号实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与其他符号相对立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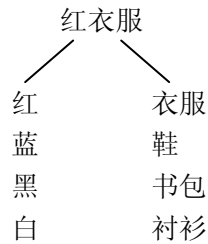
价值理论揭示出，语言实体完全是形式而不是实质 (*substance*)，是具体言语中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正因为这一形式系统的存在，在言语活动中具体的语音才能传递出具体的意义信息。同时可以看出，索绪尔的价值学说正与他的任意性原则相呼应。符号的所指不是预先给定的概念，而是由系统制约着的价值。所以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由价值理论确定了语言系统中的单位实体的存在性质后，索绪尔进一步指出，语言各项要素的关系和差别是价值的基础，也是语言状态的基础。这些关系都可归为两个不同的范围：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二者都是心理的，是语言生命所不可缺少的。

句段关系指话语中的要素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结成的关系。这种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成为句段。句段总是由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的。句段关系不仅包括一个句段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包括整体和部分间的关系，即连带关系。联想关系指在话语之外，有某种共同点的要素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贮存在人的头脑中，是潜在的记忆系列。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个联想系列。

索绪尔特别强调句段关系中的连带关系，指出句段关系不是两个独立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两个有连带关系的要素的结合，这两个要素要在一个较高的单位里互起作用才能获得价值。整体的价值决定于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部分和整体的句段关系和部分和部分的关系一样重要。由连带关系，我们看到了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之间的依存关系和语言机构的运作。例如，“红衣服”由“红”和“衣服”组成，二者有句段关系，而“红”和“红衣服”、“衣服”和“红衣服”都具有连带关系，正由于这两种连带关系，可以形成两个不同的联想系列，前者如“蓝衣服”、“黑衣服”、“白衣服”等，后者如“红鞋”、

“红书包”、“红衬衫”等，这两个系列让我们看到这个连带关系的一般性，并由此我们可以推出“白衬衫”这样的组合。图示如下：



可见，要表达的观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人们在说一句话时，联想集合和句段类型都在起作用。这就是语言机构的运作。

索绪尔认为，一切语法事实都可以纳入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当中，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对语言共时系统的完整把握。

教程编者在全书的最后提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尽管后人考证这并不是索绪尔的原话，但却是和索绪尔的整体思想一致的。这句话反映出在索绪尔语言理论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自身，研究方法是就语言结构自身来描写语言的存在，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对语言自身的把握。这正是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基本特点。

四

索绪尔的语言研究开辟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以往历史看，传统的语法研究是规范性的，长时期处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的附属地位，难于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因此对语言本体的把握难以全面深入，一直缺乏一套独立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十九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开始真正就语言自身做规律性的探究，总结出许多语言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但由于其理论落脚点是语言成分历时变化的语言事实，因此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语言成分间的结构关系。洪堡特的研究虽然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思想也颇为深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宽泛，思辩性较强，提出了有关语言的性质的一系列观念，但却没有拿出把握语言的明确的方法。

索绪尔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对语言整体的性质加以探讨。如何把握这个整体，确定这个整体的性质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索绪尔以其社会心理主义的语言观念为基础，区分了语言和言语，指出语言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语言学研究的确定的对象。继而，索绪尔又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区分，指出，对说话者来说，唯一存在的现实是语言共时的一面，而语言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要确定某个语言成分的价值，并不需要考虑它的历史来源。从而最终确定了语言共时系统的符号性质。索绪尔的理论把语言研究引入新的轨道，为后人开辟一条新的可行的研究道路。在理论方法上，他为语言研究确定了一个相对封闭，静止，具有结构系统性的研究对象，使研究得以大大深入。

二十世纪语言研究的成就证明了索绪尔语言理论历史价值，索绪尔的理论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出现，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欧洲迅速发展。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发展了索绪尔有关形式与实质的思想，创立了“语符学”。即使具有相对独立发展过程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也在许多方面与索绪尔有一致之处。到五、六十年代，生成理论逐渐取代了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成为左右语言学潮流的主导学派。虽然生成学派在研究目标与方法上不同以往，但其语言观念与索绪尔仍有一致之处，作为语

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始终是从复杂的言语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一套单纯的体系。索绪尔语言研究的基本思想至今仍是各种语言学流派的存在前提。

索绪尔的研究还廓清了语言研究的多种途径,为语言学各个分支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索绪尔的理论中增加了一些新的语言学术语范畴,诸如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共时和历时,语言和言语等。对于研究对象的划分并不等于对语言事实的割裂,而是使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前提。划分不等于只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侧面,不顾联系。事实上,索绪尔早期对原始印欧语的拟测就是把语言的共时结构与历时发展联系起来研究的一个范例,只是他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述。把研究对象加以分类再联系起来考虑,与根本上的混沌不分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索绪尔更强调语言的内部研究,强调共时研究,但无疑也为语言的外部研究、历时研究以及言语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对象。与此同时,也提供了语言研究中可资比较借鉴的不同研究层次。这一切无疑是使语言研究更趋严密精确的必要前提。二十世纪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相对局限性。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和历史的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一个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强调系统的同质性,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从历史上看,一些强调语言个人风格在语言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强调语言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语言研究学派,如欧洲的词与物学派、唯美主义学派等,在感受到语言现象的生动、丰富和复杂的同时,在对语言的统一的规律性的把握上就显得薄弱了。可见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至于以语言是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有序异质的而非同质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来批评索绪尔的观点,就未免苛责古人了,因为这些认识正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系统理论之上的。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也是具有时代性的。这个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这与19世纪兴起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相关。青年语法学派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就是反对虚妄的思辩的,虽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实体观点与绝对的实证主义观点不同,但他仍强调其研究的现实性,而非抽象思辩性。二十世纪初整体思想界有对本质论放弃的倾向,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非本质论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看来,学术思想的影响和继承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后继者而言,他们对于前辈思想的接受有些是主动的、自觉的,而有些则是不自觉的。不管人们接受与否,索绪尔的思想光辉一直照耀着语言研究的历程。象历史上所有的著名思想家一样,他为人类留下了一份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遗产。

主要参考文献:

1. Amsterdamska, Olga,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Monographs Schools Of Th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from Bopp to Saussure.*
2. 卡勒,《索绪尔》,张景智译,刘润清校,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
3. De.Mauro,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国外语言学,1983,第4期。
4. 裴文,《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商务印书馆,2003。
5.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edition critique preparee par Tullio de Mauro, 1972.*
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96。
1910-1911《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普通语言学教程》,裴文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7. 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一期。